

中国洮砚产地考辨

范卫平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甘肃合作 747000)

摘要:从隋末、唐、宋到元初的近700年间,“洮州”“临洮”互为别名、同时共存。在宋朝人有关洮砚的诗文和砚史资料中,明确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临洮。洮砚是洮州(临洮)洮河绿石砚的简称。从《明史》《清史稿》《岷州志》等史料看,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属岷州管辖的说法,于史无证,不能成立。明、清以来有关洮州的地方志和民国时的物产调查、考察实录、洮砚专志,均记载洮砚出产于古洮州(今甘肃省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但同时同类有关岷州的史料,均无洮砚出自岷州、属于岷州特产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明确,古洮州、今卓尼县洮砚镇是唯一的“中国洮砚之乡”。

关键词:洮砚;洮州;卓尼县;中国洮砚之乡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19)03-022-08

“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洮砚,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但是,“洮砚自古出岷县”说和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将“中国洮砚之乡”分别授予岷县和卓尼县之后,引发了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1)洮砚品牌的唯一性受到挑战。中国洮砚究竟出产于古洮州、今卓尼县,还是出产于古岷州、今岷县?这个本来无需争辩的历史事实,现在却成了必须进行考辨的学术性问题;(2)洮砚的独特性成了问题。本来,洮砚品牌的行业标准,历史形成的是以古洮州、今卓尼县喇嘛崖一带所产洮砚的等级标准为标准,而“洮砚自古出岷县”说和岷县洮砚(西江石、禾驮石)的出现,对确定洮砚品牌的行业标准造成了冲击,洮砚品牌的行业标准依何而定?由谁来定?也成了问题;(3)洮砚地理坐标的标识,对洮砚产业的监管和未来发展影响深远,但因存在争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如何标识洮砚地理坐标,也成了问题。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更澄清洮砚产地问题,因此,对洮砚产地的历史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本文从宋朝人有关洮砚诗文、砚史资料,洮砚出产地“临洮”与洮州的关系,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管辖问题,洮砚得名原由,明、清以来本地和省级地方志,以及民国时期的物产调查、考察实录、洮砚专志

中有关洮砚的记载等五个方面,对洮砚产地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为解决上述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

一、“洮砚自古出岷县”说简述

1995年4月22日,《甘肃日报》刊发李璘先生《洮砚自古出岷县》一文,首次提出“洮砚自古出岷县”说,其后,《岷县史话》、岷县政协编《洮砚文化》、张润平《岷县历史文化与民俗散论·岷县洮砚文化形成历史溯源》、包孝祖、季绪才《中国洮砚》等书,以及《洮砚自古出岷州》(《甘肃日报》2010年8月8日第2版)、张润平、白文科《岷县洮砚文化形成及创新发展》(《甘肃日报》2018年11月29日第11版,《定西日报》2019年1月6日第8版)等文章,反复强调“洮砚自古出岷县”。

“洮砚自古出岷县”说的论点、论据和基本逻辑是:(1)“对于岷县境内产洮砚石材的事实,古人早就有觉察。苏东坡在其《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中说‘郡洮岷,至中国’,就指出洮砚石材产于‘洮岷’地带。黄庭坚的诗作《刘晦叔许洮河绿石砚》中,有‘旧闻岷石鸭头绿’的诗句,就直称洮砚为‘岷石’。”^[1](2)宋人谈到洮砚产地时,有“出临洮”“来临洮”的文

收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西北民族走廊藏汉杂居区文化生态研究”(2013A—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卫平(1963—),男,甘肃卓尼县人,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河洮岷文化。

字,而“元以前,临洮的称谓就专指现在的岷县。元以前的所有文学艺术、历史及各种资料所记录的‘临洮’,全都是以前以现今的岷县为基准地域对象的”^[2],据此断言:“洮砚就出产在古时的临洮、现今的岷县。证据凿凿,毋庸置疑。”^{[2]255}(3)“洮砚石材出岷县”,“分布在卓尼县一带的洮砚石材地区,恰好处在岷县、临潭、卓尼三县交界处。这一地区,在唐代陷于吐蕃,宋元属于铁城地区,明洪武四年(1371)归岷州管辖,属岷州十七里的底藏里。清也属岷州管辖。”^{[2]256-257}(4)古人有“洮河砚”“洮河绿石”之称,说明“洮砚因洮河而得名”,并非因洮州而得名,以此否定洮砚是洮州特产的历史事实。

二、从两宋人有关洮砚的诗文、砚史资料看,洮砚出产于洮州

1. 北宋黄庭坚(1045~1105)有三首前后相连的诗写到洮砚,其中两首诗三次写明“洮州”。

(1)《以团茶洮州绿石研赠无咎文潜》诗,其中有“洮州绿石含风漪”^[3]句,两次写明“洮州绿石”。有人引证此诗时,将标题和诗句中的两个“洮州”改写为“洮河”,但赵朴初先生在化用此诗题咏洮砚时,记忆清晰,仍用“洮州”,诗云:“风漪分得洮州绿,坚似青铜润如玉。”^[4]

(2)《谢王仲至惠洮州砺石黄玉印材》诗云:“洮砺发剑虹贯日,印章不琢色蒸栗。”^{[3]235}“洮州砺石”即洮砚石,诗中简称“洮砺”。

(3)《刘晦叔许洮河绿石砚》,诗题下注:“晦叔,名昱。洮州,唐临洮郡,后陷吐蕃。熙宁中收复。”^{[3]233}注为黄庭坚弟子任渊(约北宋元祐五年1090~南宋隆兴二年1164)所做,旨在注明“洮河绿石研”的来源。若把诗题“洮河绿石研”和注文“洮州,唐临洮郡”简化为等式,即:洮河绿石研=洮州绿石研。

从黄庭坚这三首诗和任渊的注来看,北宋人关于洮砚的产地是明确的,即洮砚出产于洮州,不存在非洮州的洮河绿石砚。那么,为什么黄庭坚又说“久闻岷石鸭头绿”呢?这是否意味着黄庭坚明确指出“北宋岷州是洮砚的出产地”^{[4]18}“洮砚石材出自岷州”^{[4]72}呢?回答是:否!理由如下:

其一,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表意功能和表现方法,史书文体重在纪实,诗歌文体重在抒情,二者不可等同。诗歌要在简短的诗句中表达丰富的情志,上下互文是常用手法。黄庭坚此诗表达了他即将获得洮砚的欣喜、企盼之情。诗题中言“洮河绿石”,首句言

“久闻岷石”,上下互文,“洮河”“岷石”对举,是说此砚来自遥远的边地洮岷一带。这与苏轼《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所说“郡洮岷,至中国”句意相同,是泛言洮砚来自遥远的边地,并非确指洮砚出自岷州,而“直称为‘岷石’”。

其二,诗歌重意象,“洮河绿”与“岷山石”,一水一山,水动山静,两相映照,意象鲜明。诗人想象鸭头绿的环境:遥远的边地——洮岷——洮水,岷山,山高水深,洮河绿石出产于此。

其三,孤证立说,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岷石”,仅此一见,岂能据此断言黄庭坚明确指出“北宋岷州是洮砚的出产地”“洮砚石材出自岷州”呢?假如,北宋时期真有岷州砚、岷山砚等“岷砚”,黄庭坚等宋朝人不会不留下“岷州绿石”之类的记实性文字。但从宋、金、明、清至今,历史上没有“岷州绿石”“岷山绿石”之名,而只有洮州绿石、临洮绿石之称。

2. 南宋高似孙(1158~1231)《砚笈·洮石砚》引晁无咎《和山谷诗》云:“洮州石贵双赵璧,汉水鸭头无此色。”又引杨信相诗云:“但见洮州琢蛾绿,焉用歙溪眉子为?”又引谢幼槃诗云:“老松收烟琢元玉,可试洮州鸭头绿。”^[5]从这三处的“洮州”也可以断言,两宋人很明确:洮砚出自洮州,洮州出产洮砚。

3. 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谢王恭父赠梁杲墨》诗有“洮州绿玉试松花,星潭黑云走风沙”之句。^[6]

上引两宋人的诗、注及砚史资料,共有八处明言洮砚出产地是洮州。

那么,洮砚是否既产于洮州、也产于岷州,或者说产于“洮岷一带”呢?李璘先生说:“对于岷县境内产洮砚石材的事实,古人早就有觉察。苏东坡在其《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中说‘郡洮岷,至中国’,就指出洮砚石材产于‘洮岷’地带。”^[1]此说牵强附会,难以成立。原因如下:

其一,苏轼(1037~1101)《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云:“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其中,“洗之砺”不好理解,近查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集》注云:“洗:《文章辨体汇选》《八代文钞》作‘洮’。”^[7]始知“洗之砺”,即“洮之砺”,也就是黄庭坚《谢王仲至惠洮州砺石黄玉印材》诗中的“洮砺”;“发金铁”即黄庭坚诗“发剑”之意。由此可知,苏轼、黄庭坚都知道“洮砺”“洮之砺”,即出产于洮州的“洮州砺石”,即洮砚石。洮砚石不仅能发墨,还是非常好的砺石,能“发金铁”“发剑”。

其二,“郡洮岷,至中国”大意是:能“发金铁”的“洮之砺”(洮州砺石),来自遥远的边地洮岷。“洮岷”

不是确指岷州,而是泛指“边地洮岷”,犹今言“大西北”。岂能由此断定苏轼“对于岷县境内产洮砚石材的事实”“早就有觉察”?

诗、铭之类的文字,岂能当洮砚产地考察报告来读?苏、黄二人既没有实地考察过洮砚产地,也没有放出卫星监测器进行遥感探测,岂能仅凭“郡洮岷”一句,就断言苏轼已“觉察”到“岷县境内产洮砚石材的事实”?又怎能凭“岷石”二字,就断言黄庭坚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洮砚石材出自岷州”的人?

三、洮砚出产地临洮,就是洮州

有关文献记载,洮砚出产于“临洮”。南宋陆游(1125~1210)有“风漪奇石出临洮”^[8]之句;高似孙《砚笈》载“洮石砚:石出临洮(山谷)”^{[5][20]};赵希鹄(约1180~约1250)《洞天清录》云:“洮河绿石砚……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9]金朝元好问(1190~1257)《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诗云:“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研来临洮。”^[10]明王世贞(1526~1590)《宛委余编》称洮砚为“临洮(砚)”^[11];《西清砚谱》所载乾隆皇帝“戊戌(1778)季夏日御铭”洮砚曰:“临洮绿石”^[12]。

那么,为什么出产于洮州的洮砚,又被说成是“石出临洮”的“临洮绿石”呢?“临洮”与“洮州”究竟是何关系?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不同阶段行政建置及名称的“临洮”,分别是:(1)从秦王嬴政八年(前239)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以今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为治地的临洮县、临洮郡,历时858年,可谓之“岷县临洮”; (2)从隋末一唐一宋一蒙元之初,以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卓尼县(古称洮州)为治地的临洮,历时近700年,可谓之“洮州临洮”; (3)金一元一明一清至今,以今定西市临洮县(古称狄道)为治地的临洮府、临洮县,至今有877年,可谓之“狄道临洮”。对“岷县临洮”和“狄道临洮”,今人知之较多,而对“洮州临洮”,知者甚少,故略申述之。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于吐谷浑洮阳城置洮阳郡,寻立为洮州,后世因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置临洮郡,郡治美相(今卓尼县喀尔钦乡羊(阳)坝古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隋临洮郡归唐,武德二年(619)复置洮州。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洮州移治洪和城(今临潭县新城镇),以其地置临洮镇,次年度。贞观十二年(638),于洮州博陵县故地置临洮镇,次年改为安西府。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至唐肃宗

乾元元年(758)的16年间,洮州复为临洮郡。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吐蕃攻占洮、秦、成诸州,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关(陕西陇县),尽陷陇右之地,称洮州为“临洮城”,其后347年,至北宋大观二年(1108)收复,宋徽宗诏令改“临洮城”仍旧为洮州。如果,从炀帝大业三年(607)废洮州建临洮郡算起,到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改临洮城仍为洮州,其间“洮州临洮”之称,历时502年。但实际情况是,直到宋末元初,仍以“临洮”称洮州,如《元史·本纪·宪宗》《世祖一》《列传·郑鼎》《列传·郝经》等,均记载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时,“秋八月,师次临洮……九月壬寅,师次武刺,分三道以进”。^[13]这里的“临洮”即洮州(治今临潭县新城镇),“武刺”即甘肃省迭部县达拉沟。马端临(约1254~1323,即宋理宗宝祐二年~元英宗至治三年)《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一·吐谷浑》:“又攻拔其洮阳、泥和二城,置洮州(今临洮郡地)而还。”^[14]这些记载说明,宋末元初,“洮州临洮”之称仍然流行。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在洮州置临洮郡,到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途径“临洮”,“洮州临洮”之称,历时646年之久,概言之曰700年。

从《隋书》《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通志》《太平御览》《文献通考》《宋史》《元史》《续资治通鉴》等文献看,从隋末、唐、宋直到元初,行政建置概念中的洮州与临洮、岷州与和政,同时共存,互为别名。如《旧唐书·李晟传》:“李晟,字良器,陇右临洮人。”^[15]《新唐书·李晟传》:“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人。”^[16]《新唐书·志·地理四》:“洮州临洮郡”,“岷州和政郡”^{[16][1043]}。《通典·食货·赋税下》:“和政郡(贡龙须席六领并青黄色,今岷州)……临洮郡(贡麝香十颗,今洮州)”^[17]《通典·州郡四·古雍州下》:“临洮(洮)一县(临潭);和政(岷)三县(溢乐、祐川、和政)。”^{[17][21]}“临洮郡……洮州(今理临潭县。)……大唐为洮州,或为临洮郡。”“和政郡……岷州(今理溢乐县)……大唐复置岷州,或为和政郡。”^{[17][22]}《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岷州,和政。……管县三:溢乐,祐川,和政。”“洮州,临洮。……管县二:临潭,美相。”^[18]《太平御览·州郡部》:“洮州:《十道志》曰:‘洮州,临洮郡。’”“岷州:《十道志》曰:‘岷州,和政郡。’”^[19]《通志·地里略·四渎》:“临洮,洮州也……洮水,出临洮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20]《宋史·志·地理三·陕西》:“洮州。唐末陷于吐蕃,号临洮城……大观二年收复,改临洮城仍旧为洮州。”^[21]《文献通考·輿地考八·古雍州历代沿革之图》:“唐为洮州,或为临洮郡。”“唐复置岷州,或为和政郡。”^{[14][2535]}

综上所述,所谓“元以前,临洮的称谓就专指现在的岷县。元以前的所有文学艺术、历史及各种资料所记录的‘临洮’,都是以现今的岷县为基准地域对象的”^[2]，“洮砚就出产在古时的临洮、现今的岷县。证据凿凿,毋庸置疑”^{[2]255}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相反,我们可以断言,南宋人高似孙的“洮石砚:石出临洮”、赵希鹄的“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陆游的“风漪奇石出临洮”、元好问的“才得此研来临洮”等所言之“临洮”,既不是从秦—隋末的“岷县临洮”,也不是指从金、元、明、清至今的“狄道临洮”,而是指从隋末—唐—宋—蒙元之初的“洮州临洮”。其后,明、清人论洮砚时,也因袭唐宋700多年形成的“洮州临洮”之称,如明王世贞《宛委余编》称洮砚为“临洮”、清乾隆皇帝御铭“临洮绿石”。至此,可明确,临洮砚=洮州砚,临洮绿石=洮州绿石。

四、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属岷州管辖的说法,于史无证;相反,从明、清有关史料看,洮砚石材产地一直属洮州管辖

论者认为“洮砚石材出岷县”,“分布在卓尼县一带的洮砚石材地区,恰好处在岷县、临潭、卓尼三县交界处。这一地区,在唐代陷于吐蕃,宋元属于铁城地区,明洪武四年(1371)归岷州管辖,属岷州十七里的底藏里。清也属岷州管辖。”^{[2]256-257}

1. 让我们看看《明史·地理志三》如何记载:

洮州卫元洮州,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洮州军民千户所,属河州卫。十二年二月升为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陕西都司。

岷州卫元岷州,以旧佑川县地置,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岷州千户所,属河州卫。十一年七月升为卫,属陕西都司。十五年四月升为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二十四年又置州,改军民指挥使司为卫。四十年闰五月,州废,仍置军民指挥使司……东北有铁州,元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置铁城千户所,属河州卫,后废。领所一。^[2]

从这段记载看:(1)元朝时,洮州、岷州、铁州互不隶属,同属吐蕃宣慰司;(2)洪武四年(1371)正月,同时置铁城千户所、岷州千户所、洮州军民千户所,也互不隶属,而是同属河州卫;(3)岷州千户所尚未升“卫”时,铁城千户所已废,不存在被岷州卫管辖的事;(4)洪武十一年(1378)七月,岷州千户所升为卫,十二年(1379)二月,洮州军民千户所也升为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同属于陕西都司,同样互不隶属;(5)岷州

卫仅“领所一”,即“西固城守御军民千户所。”^[2]

如此,则所谓“据史料记载”“铁城地区,明洪武四年(1371)归岷州管辖”,于史无证。相反,据明嘉靖21年成书的《陕西通志》可知(见后文)，“洮石砚”为洮州卫特产,说明洮砚石材产地的喇嘛崖一带,明代仍隶属于洮州。如果再联系宋朝黄庭坚等人称洮砚为“洮之砺”“洮州砺石”“洮州绿石”的说法,可以明确,从宋至明朝,洮砚石材产地的喇嘛崖一带,一直为洮州所辖。

2. 再看《清史稿》的记载:

巩昌府:明置府,领州三,县十四。顺治初,因明制……(雍正)八年,增置岷州及靖远县……(乾隆)十三年,改洮州卫为厅来属……领厅一,州一,县七……岷州……明卫。雍正八年改置……洮水自西洮州厅入,东流过城北,叠藏河西南自杨土司境来……洮水西北复入洮州厅……洮州厅……洮水……径厅城南,东入岷州,折而西北,复入厅境,径厅东北入狄道……土司三:著逊、卓泥杨氏、资卜马氏。^[23]

从这段记载看:(1)清因明制,洮州、岷州辖地未有变化,只在乾隆十三年(1478),改洮州卫为厅,与岷州隶属于巩昌府;(2)从洮河流经路线:“洮水自西洮州厅入,东流过城北,叠藏河西南自杨土司境来……洮水西北复入洮州厅”和“洮水……径厅城南,东入岷州,折而西北,复入厅境,径厅东北入狄道”的记载看,洮砚石材产地的喇嘛崖一带,清朝时为洮州厅辖地。如此,所谓“清袭旧制,仍属岷州管辖”之说,也无史证。

3. 岷州地方志明确记载,洮砚石材产地由卓尼土司杨汝松管辖。康熙四十一年(1702)成书的汪元綱《岷州志》,在卷三《舆地下·番属》记载“岷番”之后,又记“洮番”即洮州杨土司和咎土司所辖领地。其中,卓尼土司杨汝松管辖之地中,有“达窝族、纳儿恶力山族、沙扎族、格喇族、丁哈族、哈古族、喇嘛族、哈日山族”^[24]等。其中,“达窝族”,即今甘肃省卓尼县纳儿行政村所辖“达勿”村。达勿村又分上达勿、下达勿,喇嘛崖即位于下达勿村。“格喇”今作“结拉”“丁哈”今作“丁尕”“哈古”今作“卡古”“哈日山”今作“卡日山”。这些村子正是今卓尼县洮砚镇纳儿、结拉两个行政村,也就是历史上洮砚石料的出产地。

另外,《岷县洮砚文化形成及创新发展》一文说:“明洪武二十一年(1378),洮州资堡部落首领咎南秀节投诚内附,分布在卓尼县一带的洮砚石材地区,属岷州十七里中的底藏里。”^[25]这里需指正两点:(1)“明洪武二十一年(1378)”有误,洪武二十一年是

1388年,应为洪武十一年;(2)咎土司“系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从来没作过岷州土司。《清史稿》卷五一七《列传》第三〇四《土司六·甘肃·洮州厅》:“咎南秀节,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明洪武十一年,率部落投诚。十二年,督修洮州边濠城池……永乐三年,赐姓咎。……清顺治十年,归附。奉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札付,咎天锡于光绪二十年承袭。咎氏居资卜族。”^[26]《洮州厅志》卷十六《番属》载:“土司咎天锡,居城东南二十里资堡族。始祖南秀节,系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于前明洪武十一年率领部落投曹国公。”^[27]前述汪元綱《岷州志》卷三《舆地下·番属》也记载咎土司为洮州土司。

如此,所谓“洮州资堡部落首领咎南秀节投诚内附,分布在卓尼县一带的洮砚石材地区,属岷州十七里中的底藏里”的说法,也无史据。

综上,所谓明、清时洮砚石材产地属岷州管辖、“洮砚石材出岷县”的说法,于史无证,纯属臆造。

五、从洮砚的名字看,洮砚出产于古代洮州洮河边喇嘛崖一带,即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

洮砚因何得名?有人特别强调“洮砚因洮河而得名”,否认洮砚因洮州而得名,借以否定洮砚是洮州特产的历史事实。

那么,地方特产究竟是怎样命名的呢?按思维习惯和地方特产命名常识,地方特产之名,都是“地方名+物产名”,如“北京烤鸭”“兰州百合”“岷县当归”等。其实,按思维习惯和生活常识,用来“定位”的最好坐标,也是行政区划而非山水之名或笼统、模糊的区域地理概念。譬如,当有人问你是哪儿人,你会说“我是兰州人”,而不会因为兰州有黄河穿城而过或有五泉山而说“我是黄河人”或“五泉山人”;同理,若问“这是哪儿出产的砚?”定会答曰:“端州(砚)”“歙州(砚)”“洮州(砚)”或“临洮(砚)”,于是就有了端砚、歙砚、洮砚之名,或若王世贞所简称的“端、歙、临洮”。按思维习惯和地方特产命名常识,洮砚的得名应该也是“地方名+物产名”,即“洮州+砚”或“临洮+砚”。

北宋诗人黄庭坚称洮砚为“洮州绿石”或“洮州砺石”,南宋诗人杨万里则称为“洮州绿玉”,高似孙《砚笺·洮石砚》引晁无咎《和山谷诗》云:“洮州石贵双赵璧”,引杨信相诗云:“但见洮州琢蛾绿”,引谢幼槃诗云:“可试洮州鸭头绿”等;明王世

贞《宛委余编》以地方名直称洮砚为“临洮”;乾隆题铭“临洮绿石”。可见,洮砚的得名方式没有违背“地方名+物产名”的思维习惯和地方特产命名的方式。

“名”之外,洮砚还有“字”。洮砚的“字”来自于洮砚出产的地点:洮河。黄庭坚、赵希鹄等人又称洮砚为“洮河绿石”。赵希鹄《洞天清录》曰:“洮河绿石砚……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8][1]}这里的“临洮”即洮州、“大河”即洮河。但是,洮州境内的洮河可谓长矣,是不是洮河流域所产绿石都是洮砚呢?当然不是!那么,洮州哪儿的“大河深水之底”能出产“得之为无价之宝”的洮河绿石砚呢?回答是:自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以来的近千年时间中,只有一个地方,即洮州临洮郡洮河边的喇嘛崖、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镇的喇嘛崖。唯有喇嘛崖出产“得之为无价之宝”的洮河绿石砚。所以,洮河砚、洮河绿石砚中的“洮河”二字,不是泛指性的洮河,而是确指喇嘛崖的洮河。换言之,洮河绿石砚中的“洮河”由泛指性的河流名变为确指性、特指性的地点名。所谓“洮河砚”,是确指、特指洮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镇洮河边喇嘛崖及其附近所出之砚,并非泛指洮河流域远离洮河的地方出产的绿石也称洮砚。如此,“洮河绿石”“洮河砚”之称,不仅没有否定洮砚出自洮州的历史,相反,它准确地指明了洮砚出产于洮州哪儿的问题。

“名”与“字”之外,洮砚还有依其特征命名的别称雅号。最初、最通行的洮砚别称,可能是“绿石”二字,另有“鸭头绿”“风漪石”“鸚鵡石”等雅称。

若把洮砚的名、字、别称合起来,即“地方名+地点名+物产名”,才是洮砚的全称:“洮州洮河绿石砚”。分称则有:“洮州绿石砚”“洮州绿石”“临洮绿石”“洮州绿”“洮州石”“洮州砚”或“洮河绿石砚”“洮河绿石”“洮河砚”“洮石砚”等,简称“洮砚”。

洮砚的简称,早在北宋时就有了。北宋人任渊《山谷诗集注》在目录中《谢王仲至惠洮州砺石黄玉印材》诗题下注:“因‘洮砚’附见。”^{[3][13]}南宋时,杨万里有《利州路提刑秘书张季长送洮研发砚乃一段柏木也作诗谢之》诗^[28],陆游《休日与客燕语既去听小儿诵书因复作草数纸》诗后注:“张季长寄洮砚。”^[8]赵希鹄《洞天清录》曰:“耆旧相传,虽知有洮砚,然目所未睹。”^[9]这,都已经把“洮州洮河绿石砚”简称为“洮砚”了。

六、明、清以来的地方志和民国时的物产调查、考察实录、洮砚专志,均持续不断地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出产于洮州之喇嘛崖一带,即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

1.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赵廷瑞主修、马理、吕柟编纂《陕西通志》卷三十六《民物三·物产》记:“洮州卫:洮石砚(洮河绿石,出自上关,西与西番接壤,唐、宋以来,名士多用之)。”^[29]

2. 康熙二十六年(1687),吴垚《洮州卫志》,胪列“土产”仅16种,却在“酥油、芥油”之后,赫然列着“砚石”二字。^{[27]24}

3. 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刻之《巩昌府志》卷八《物产》,在胪列“合郡之所同”者后,对“各产不一,另起之”。记“洮州所出”三种:“酥油、芥油、砚石。”^[30]洮州物产难道仅此三物?非也,仅记特产耳!

4. 乾隆元年(1736)刻《甘肃通志》卷二十《物产》载“巩昌府”所出者:“洮石砚,出洮州卫。”同时,在“空青石、鹿茸、雕”三物之下,记“洮岷出”三字^[31]。这说明,洮岷一带共出的特产中没有洮砚,洮砚仅出自洮州卫。

5. 约乾隆十六年(1751),无名氏撰成《洮州卫志》一卷。该书不题撰修时间,但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小注云:“记事至乾隆十四年”^[32]。该书“物产”仅记一物,曰:“洮石砚。”^{[27]43}

6.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彦笃修、包永昌纂的《洮州厅志》成书。该书卷二《舆地·物产》记有物产127种^{[27]127-129},仅在“石之属·洮砚石”下有介绍性文字,全文曰:“洮砚石出喇嘛崖,在厅治东北,距城九十里。其道由城至石门口渡洮河,经岷地哇儿沟,下石门峡,交咎、杨土司界,过丁哈族、哈古族、纳儿族,路径迂折陡险。其崖西临洮水,磴道盘空。崖半横凿一径,缘崖而过,其石即于径侧凿坑取之。向犹浅,今则渐深,用力倍难。闻崖底石甚美,理亦近是,然洮水至此流绝,驶浪激崖而转,不可至也。又,山即险峻,神亦灵异,夏秋间或凿取之,辄降冰雹,灾及数十百里焉。”^{[27]128}这155个字,简要而准确地介绍了洮砚的出产地。

7. 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宣统元年(1909)刊刻的《甘肃新通志》卷十二《物产》载:“洮石砚,出洮

水者佳。然石之膩致尚不如贺兰石。”^[33]文中虽未明写洮砚出自洮州,但说“出洮水者佳”,即指喇嘛崖所出之洮砚为佳。

8. 民国十七年(1928),聂守仁编辑之《甘肃物产志稿》记:“石砚:宁夏贺兰山石制砚甚佳,亦极多,而石质滑膩不受墨;洮州所出之绿石,制砚甚良,较贺兰石更佳,石工亦巧于刻镂,运至境外者甚多。”^[34]明言洮砚出自洮州。

9.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929~1936),刘郁芬监修、杨思、张维等编纂的《甘肃通志稿》,其中有:“洮河绿石出洮州,在洮河下游临潭县境内,此地由卓尼土司杨氏辖领。”

10. 民国二十五年(1936),河南开封人韩军一著成《甘肃洮砚志》,明确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卓尼土司杨积庆所辖喇嘛崖一带。《叙意》一节言:“石之可为砚者,有广东端州石,安徽歙溪石及甘肃洮州石。”洮砚产地“喇嘛崖洮石窟”,系“卓尼土司官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子余,名积庆……所领辖”,故专列《洮州》《土司》两小节简述之。《石窟》一节又言:“洮砚石窟……开发最早,石质清润可贵者,惟喇嘛崖老石窟资用为著。喇嘛崖老窟,自宋代已采其石,石之清标,多在他山之上。”^[35]这里明确指出,从北宋以来,“洮砚”品牌是由喇嘛崖及其附近砚石创得。

11. 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37~1938),顾颉刚一行到西北考察,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详记各地物产。1938年5月12日记载,在当时的临潭县城(今新城镇),“此间人士赠予数砚,有径半尺许者,雕镂花纹绝精工,苦未能携以远行也”,谈到砚之所出,曰:“杨土司所属之‘黑番’有金矿,今用土法淘取。喇嘛崖在县城东北九十里,傍洮河,出鹦哥石,取以作砚,甚细致,谓之‘洮砚’。”^[36]

12. 民国三十年(1941),陈宝全所著《甘肃一角》之(4)记“绿波带水之洮砚”,其文曰:“临潭城北喇嘛崖,属杨复兴土司之拉卜什旗管辖,产有水成岩之砚石,为国内文房明宝玩品,石带绿色,质含水分,著墨于内,经久不涸。”^[37]“临潭城”即今临潭县新城镇,民国时为临潭县城。

13. 民国三十年(1941),《甘肃物产调查表》之《甘肃特产纪要·用物(旧有)》:“石砚台(洮州砚),产地临潭,雕刻各种形状,有八骏马者,按石上白点,雕为花马。”^[38]民国临潭县包括卓尼杨土司所辖之地,故曰洮州砚“产地临潭”。

14. 1994年版《卓尼县志》,辟《洮砚志》专章,详记卓尼特产洮砚。《洮砚志》共分四章十六节,全文长达

24页,两万余字,详细记述洮砚的石料(含产地、矿点、石料采掘、矿区管理4小节)、石质(含特性、石理、石脉、石色、石纹、石病6小节)、砚工(含砚工传承、民间砚工分布2小节)、雕刻(含造型、传统图案、雕刻技艺、雕刻工序4小节)^[9]等。又在《地理志·物产资源·矿藏·非金属矿藏》中,对洮砚石矿带进行了详细介绍。^{[9]57}

综上,从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陕西通志》,到1994年版《卓尼县志》,452年间,不论官修的本地或省级地方志,还是民国年间的物产调查、学者身临其地的考察实录以及《甘肃洮砚志》,均持续不断地记载:洮砚出产于洮州,是洮州的特产。

与此同时,有关岷州的地方志,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岷州卫志》、康熙四十一年(1702)《岷州志》、光绪年间无名氏抄本《岷州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岷州续志采访录》,以及省级地方志,如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陕西通志》,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巩昌府志》,乾隆元年(1736)的《甘肃通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甘肃新通志》,民国年间的《甘肃物产志稿》(1928)、《甘肃省志稿》(1936)等,在记载物产或实业时,均无洮砚出自岷州、是岷州特产的文字。虽然,1995年版《岷县志》第三十三篇《艺文》之第四章《美术 工艺》中,以“砚雕”为题,介绍了洮砚雕刻工艺的改进,也只有83个字,且无岷县洮砚产地的任何文字。

如此说来,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陕西通志》到1995年版《岷县志》,453年间,有关岷县的地方志,均未言洮砚是岷州、岷县的特产,也没有岷县砚石产地、洮砚制作情况的记录。读者岂能从中找到“洮砚自古出岷县”的历史证据呢?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洮砚自北宋出产以来,历宋、金、元、明、清、中华民国至今,近千年间,有关文献对洮砚产地的记载未有变化,均记载洮砚出产于古代洮州、即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镇喇嘛崖一带,是洮州的特产;同时,有关文献均无洮砚出自岷州、是岷州特产的记载。因此可以说,古代洮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镇是唯一的“中国洮砚之乡”。

注释:

①引自岷县政协编:《洮砚文化》(《岷县文史》第十一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75页。(民国)刘郁芬监修、杨思、张维等编纂《甘肃通志稿》,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七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97页

有“砚:洮石色青,贺兰石色紫,皆佳品”记载,笔者未找到《洮砚文化》中的这段文字,待细查,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 [1]张福宏.岷县史话[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140.
- [2]张润平.岷县历史文化与民俗散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252-253.
- [3](宋)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M].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234.
- [4]包孝祖,季绪才.中国洮砚[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20.
- [5](宋)高似孙.砚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3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0.
- [6](宋)杨万里.谢王恭父赠梁杲墨//全宋诗(第42册)[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458.
- [7](宋)苏轼.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轼文集·三苏全集(第15册)[G].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68-169.
- [8](宋)陆游.休日与客燕语既去听小儿诵书因复作草数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570.
- [9](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 [10](金)元好问.元好问诗编年校注[M].狄宝心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598
- [1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三辑第三十五册)[G].合肥:黄山书社,2016:586.
- [12](清)于敏中.西清砚谱(5)[M].北京:中国书店,2014:36.
- [13](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9.
-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2621.
-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61.
- [16](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863.
- [17](唐)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36.
- [1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995,997.
- [19](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804.

- [20](宋)郑樵.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544-545.
- [2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66.
- [22](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11.
- [23][26]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2113-2114,14307-14308.
- [24]甘肃省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岷州志校注[M].岷县:岷县印刷厂装帧印刷,1988:95-96.
- [25]张润平,白文科.岷县洮砚文化形成及创新发展[N].甘肃日报,2018-11-29(11).
- [27]张俊立.洮州厅志校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413.
- [28](宋)杨万里.利州路提刑秘书张季长送洮砚发视乃一段柏木也作诗谢之//全宋诗(第42册)[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383.
- [29](明)赵廷瑞,马理,吕枏.陕西通志[M].董健桥,等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906.
- [30](明)杨恩,(清)纪元.康熙巩昌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2)[G].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310-311.
- [31](清)许容,李迪.乾隆甘肃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甘肃(1)[G].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483.
- [3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1.
- [33](清)升允,长庚,安维峻.光绪甘肃新通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甘肃(3)[G].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519.
- [34](民国)聂守仁.甘肃物产志稿[Z].民国十七年(1928)稿,未正式出版.甘肃省图书馆古籍缩微阅览室,索书号:552.216/157.
- [35]韩军一.甘肃洮砚志[Z].(民国二十六年(1937)手稿,未正式出版).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室,索书号:479.93/231.
- [36]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58.
- [37]陈宝全.甘肃一角//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西北民俗文献(25)[G].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197-198.
- [38]无名氏.甘肃物产调查表[Z].未正式出版,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室,索书号:552.216/0.178.2.
- [39]卓尼县志编纂委员会.卓尼县志[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511-534.

On the Origin Place of Chinese Tao Inkstone

FAN Wei-ping

(He-Tao-Min Culture Study Institute, 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zuo Gansu 747000)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Sui(7A.D.),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Dynasty(14A.D.), “Taozhou” and “Lintao” are aliases and coexist. In the poem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aoyan of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it is clearly recorded that it was produced in Taozhou or Lintao. Taoyan is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green stone inkstone of Taohe River in Taozhou (Lintao)”. Judging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A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Documents of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Minzhou Chronicles*, the statement that origin place of Taoy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longed to the jurisdiction of Minzhou was undocumented and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ocal history of Taozhou and the property surveys, investigations, and sloga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ve been recorded that the only origin place of Taoyan is in the area of Lama Cliff of Taoyan Town in Zhuoni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Regard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inzhou, there is no record of Taoyan. Therefore, it can be clarified that ancient Taozhou and Zhuoni County are the only “hometown of Chinese Taoyan”.

Key words: Taoyan, Taozhou; Zhuoni County; the hometown of Chinese Taoyan

责任编辑:赵云